

【明】王阳明 著 阎韬 注评

# 传习录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

智慧果丛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传习录 / (明)王阳明著 : 阎韬注评, —南京 ; 江苏古籍出版社, 2001.6

ISBN 7-80643-139-X

. 传... . 王... 阎... . 传习录-注释  
. B248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24676号

## 传 习 录

作 者 : (明)王阳明著 阎韬注评

责任编辑 : 府建明

出 版 : 江苏古籍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发 行 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: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1.25 字数270千

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43-139-X/B·11

定价 : 15.00元

(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前 言



《传习录》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。王阳明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自号阳明子，人称阳明先生。他是浙江余姚人，生于明成化八年（1472），卒于明嘉靖七年（1529），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、杰出的军事统帅、成功的教育家。

阳明自幼聪明好学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，向往成为圣贤。青年时代他大量阅读宋明理学家的著作，并按朱子的格物理论去实践。但是两次累垮，一无所获，觉得成圣太难，只好止步。为愉悦身心，他与朋友一起舞文弄墨，写作诗文。既而感到这种生活没有意义，于是转而学习佛道，目的是养生和寻找精神寄托。不久，又觉得修仙成佛离家出世，抛弃了做人的义务，是错误的，于是重新回归于儒家。这时由于他有了丰富的知识和阅历，认为做圣贤需要在精神上解决问题。但是朱子教人的仅仅是注重考据、讲论的口耳之学，所以决定，重建圣人的身心之学。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，他在北京做兵部主事，开始授徒讲学，其中心内容便是确立必为圣人之志。

一场飞来横祸，打破了王阳明平静的为官与讲学的生活。明武宗正德元年（1506），阳明上疏，为因触怒宦官刘瑾而下诏狱的科道官辩护，结果廷杖四十，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。龙场在万山丛中，到处是毒蛇、瘴疠之气，周围土著皆系少数民族，语言不通，习

俗全异。没有房子住，没有蔬菜吃，阳明不得不与从人一起架屋种菜。在艰苦的环境中，为克服对得失荣辱特别是生死的系念，他日夜端坐澄默，专求静一，久而久之，心中洒落自在，达到很高的境界。他凭借自己的体验，进一步思考圣人之道真谛，一天夜里突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不觉大呼大跳，从人都惊呆了。他悟到的道理就是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”。这就是说，心就是理，要穷理只能向内而不是向外，朱子倡导的格物向外做功夫是不对的，格物即是纠正心中不正确的念头。这是他的学说——王学最基本的观念，是他在龙场动心忍性的实践结果。从此他重开讲席。正德四年他在贵阳讲知行合一，八年在滁州讲默坐澄心，九年在南京讲存天理去人欲。他的思想体系逐渐趋于成熟。

阳明不但是哲学家，也是能干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。由于历史的机缘，他从正德十二年至十六年在江西担任巡抚都御史，长年带兵作战，使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展现。他用兵最善于掌握主动，巧妙地迷惑、瓦解敌人，出其不意地予以打击。开始他做南赣巡抚，不到两年，讨平了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南边界上的多股“盗寇”。正德十四年六月，久欲谋反篡位的宁王，以十万之众在封地南昌发动叛乱。阳明在没有朝廷旨意、情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，挺身而出，承担平叛重任。他先用心理战使宁王一再推迟进攻南京的时间。宁王出兵之后，他迅速攻下南昌，迫使宁王回救老巢。然后以逸待劳，在鄱阳湖中与敌展开决战，一举歼灭数万叛军，活捉宁王。从起兵到胜利仅仅用了三十五天，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创造了辉煌的战绩。但是胜利给阳明带来的不是明媚的春光，而是压城欲摧的乌云。原来武宗早想游历江南，宁王造反成为他的借口，他不顾宁王已擒的事实，率领十多万大军汹汹南下，演出“亲征”闹剧。阳明反对劳民伤财的亲征，曾上疏劝阻，更不同意武宗玩战争游戏，重新在鄱阳湖中抓获宁王。武宗身边群小对阳明既恨又怕，恨他要求武宗罢斥奸佞，怕他从宁王府中找到他们投靠宁王的证据，纷纷

向武宗诬告阳明权重势大，将要谋反，并怂恿带来的北军士兵向阳明挑衅。情势的危险超过以往任何时候，阳明随时可能招致杀身之祸。这时他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从自己的良知出发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他对武宗的命令坚决服从，对太监佞幸不卑不亢，对北军士卒关怀体贴，同时照样巡视、练兵、赈灾、讲学，不把权奸放在心上。时间一长，谋反之说不攻自破。

在戎马倥偬之际，阳明一直坚持学术活动，其突出成绩表现在三个方面。其一是坚持讲学，不但在战事间隙，即在战争中如鄱阳湖大战中，也还是边指挥作战边进行讲学，培养了徐爱、薛侃、邹守益、欧阳德、王艮等一批王学骨干。其二是出版了《传习录》（实为传世本之上卷）、《大学》古本、《朱子晚年定论》等著作，对于王学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第一本书是王学奠基之作，重要性自不必说；第二本书从文献学上清算程朱擅改《大学》结构、增加文字的问题，说明由此得出的格物理论不正确，也很重要；第三本书则失大于得，它检选朱子强调向内用功的部分书信，说明朱子晚年已经转向心学，其中颇多牵强附会、断章取义之处，招致学界的尖锐批评。其三是提出王学最完备的理论——致良知，认为人心中固有的良知就是天理，一切依良知去做，可以在患难生死面前超脱自在。良知是本体，致是功夫，致良知是明确本体、指示功夫的最全面最简易的提法。

正德十六年武宗病死，世宗继位。由于朝廷内部的斗争，阳明平叛之功受到贬抑，跟他一同起兵的人几乎都没有得到封赏，不少人甚至被安上了罪名。阳明抗争无效，即告假省亲。不久老父去世，便在家守孝，直到嘉靖六年（1527）。在此期间，他一面发挥致良知学说，与朱子学派展开论辩，一面聚徒讲学，培养学生，扩大影响。他的弟子来自全国各地，人数之多前所未有的，每次上课常有几百人听讲，他们住在绍兴城内外的庙宇中，床位不够，轮番就寝。阳明讲课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随时随地指示良知，学生们听

讲之后振奋欣喜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。

嘉靖六年，朝廷任命王阳明为左都御史，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四省军务，处理广西少数民族起事问题。阳明区别情况，对思恩、田州的瑶、僮等少数民族的头人实行招安，圆满和平地解决了问题。而对他认为是心腹大患的八寨、断藤峡少数民族造反，则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。

嘉靖八年冬，阳明的肺病、痢疾日趋严重，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江西南安卒于归舟之中。临终前门人问遗言，阳明说：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？”带着对自己学说的自信离开了人世。

## 二

王阳明的学说——王学或阳明学，在宋明道学中属于心学一派。由于王学批判继承了道学各派乃至儒释道三教的积极成果，特别因为它具有凸显本心，贯通一切的明晰性、彻底性，所以达到很高的理论水平，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峰。

王学是通过批判朱子学而发展起来的。朱子以天理为本体，认为天理是万事万物的性，是它们不变的本质与范型。符合理的是善，违背理的是恶，万物尤其是人的终极目标是向理复归。心作为个体精神，可能符合于天理，也可能符合于人欲而违背于理，道德修养的目的就是存理灭欲。圣人之心纯是天理，大众之心充满人欲，靠自己不能认识天理，他们需要圣人的教训，他们的义务就是服从圣人。

阳明以心（良知）为本体。良知是知，知是知非，知善知恶，所以它同时也是天理。这样，天理不是外在的神秘力量，而是人心所确定的是非善恶的标准。阳明指出，正因为人人心中有理，人人本质上都是圣人，真正的权威是我心，而不是心外的圣人。良知生动活泼、变动不居，它所确定的理是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的，

因而顺应时代、实行改革也就是良知说中应有之义。

总之，朱子教人匍匐于天理、圣人脚下，而阳明教人张扬个性，自尊无畏。这是他们根本的不同之处。那么阳明学是不是像它的批评者所说的，要人师心自用，猖狂妄行？当然不是。尽管如此保证良知的客观性这个问题，在王学中没有得到妥善解决，但对于它来说，“心即理”决不意味思所欲思，为所欲为，人的思想行为终归是要符合时宜的。自尊无畏是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，并不能用来代替治国平天下的种种本领、日常生活的种种知识技能。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学习，圣人也不能例外。

明代中期以后，中国像同时代的西欧一样，开始进入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期。当时在江浙、运河流域、江西、山西以及广东的部分地区，有相当发达的商业、手工业。人们的社会、道德、审美、消费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，物质利益受到普遍重视，人们厚今薄古，崇尚当代而不是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，自我意识显著增强。与此同时，封建正统意识形态——朱子学，招致了普遍的不满。西欧在相似的情况下，出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、德国宗教改革运动，矛头对准中世纪正统意识形态教会神学的统治，鼓吹人的自由与个性解放。而中国的情形是阳明学适逢其会地出现了，它宣扬自作主宰，与朱子学展开斗争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·路德在1517年发表了《九十五条论纲》批判罗马天主教会，而王阳明在1518年出版《传习录》批判朱子学。这样一来，王学就不能仅仅看作道学中的一个派别，它与朱子学的斗争也不能仅仅看作道学内部无关宏旨的争论。王学是中国的宗教（儒教）改革理论，它对朱子学的批判乃是代表新思潮、新时代，向占统治地位的旧意识形态所做的冲击。像马丁·路德一样，王阳明并没有意识到其学说的近代意义，也不是有意与传统决裂，但这并不影响事情本身的性质。

王阳明的学说在当时的士大夫和平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

发挥了“雷霆起寐，烈耀破迷”的作用。从京师到山野，从达官贵人到普通民众，有许多人在讲王学，人们的思想由此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。在近现代史上，主张革新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陈独秀、鲁迅等都从王学的自尊无畏的精神中受到启发和鼓舞。现代新儒学的代表如熊十力、梁漱溟、贺麟、牟宗三等人继承发扬了王阳明的心学观点。阳明学传到日本，产生了日本的阳明学派，它代表新兴的市民的利益的，向代表封建的日本朱子学展开进攻，促成了明治维新运动，将日本历史航船转入资本主义的轨道。可叹的是，由于历史的曲折发展，阳明学在自己的诞生地中国，没有能像在日本那样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

今天，从总体上来说王学已经过时，但它作为传统文化优秀代表之一，仍然值得学习与借鉴。除了自作主宰、不迷信权威的精神之外，我们还可以从阳明著作中学到万物一体的博爱精神，纤恶必除、言行一致的彻底为善精神。阳明看到商品经济影响下产生的腐败，特别提出以修养道德来抵御它。此外还可以学到阳明的渗透着辩证精神的思维方法、学习方法、教育方法等等。当然，对于阳明思想中的糟粕，如没有民主思想，轻视自然科学等，应持批判态度。

### 三

通行的三卷本《传习录》，由钱德洪编辑，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刻于湖北黄梅。上卷为徐爱、陆澄和薛侃所辑王阳明语录，曾刻于赣州。中卷为南大吉所抄录并收在续刻《传习录》中的阳明部分论学书信，钱氏编辑时对篇目做了微调，并改为问答语。下卷为阳明去世后陈九川、黄直等人提供并经钱氏整理的语录。

《传习录》包含了王学所有重要观点。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、心即理、心外无理、心外无物、意之所在即是物、格物是诚意的功夫

等观点，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，要领在于体悟实行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，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。中卷有书信八篇。在致王学批评者罗钦顺（整庵）、顾璘（东桥）的信中，除回答他们对于知行合一、格物说的问难之外，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、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。在给当时尚非王门弟子聂豹（文蔚）的信中，在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，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。致弟子周道通、陆澄（原静）、欧阳德（崇一）的信，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，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。另有两篇短文，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。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，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，提出本体功夫合一、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，它使王学体系齐备，但也引起明中后期学界的长期争论与王学的分化。

《传习录》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思想，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，以及生动活泼、善于用譬、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。因此该书历来受到士人的喜爱，可以说王学的传播，除了阳明师生的讲学外，主要是靠了该书的刊布而实现的。

这本注评，以明谢廷杰编《王文成公全书》（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）为底本，参考了明施邦曜编《阳明先生集要》（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本）、近人叶绍钧点注《传习录》（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7年）、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《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》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，1998年）、吴光等编《王阳明全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等书。本书在标点、注释方面，吸取了各本的成果，亦间有匡正与补充；在评论方面，对各家评语有所采择，但多数则为鄙见。水平有限，错谬疏漏之处一定不少，切盼方家不吝赐正。

阎 韬

2001年4月

# 目 录

前言 .....	1
传习录卷上 .....	1
传习录卷中 .....	123
传习录卷下 .....	230

# 传习录卷上

## 徐 爱 录

先生于《大学》格物诸说，悉以旧本为正，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。爱始闻而骇，既而疑，已而殫精竭思，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，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热，断断乎“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者也。先生明睿天授，然和乐坦易，不事边幅。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，又尝泛滥于词章，出入二氏之学，骤闻是说，皆目以为立异好奇，漫不省究。不知先生居夷三载，处困养静，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，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。爱朝夕炙门下，但见先生之道，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，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，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。十余年来，竟未能窥其藩篱。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，或犹未闻其警欬，或先怀忽易忿激之心，而遽欲于立谈之间，传闻之说，臆断悬度，如之何

其可得也！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，往往得一而遗二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。故爰备录平日之所闻，私以示夫同志，相与考而正之，庶无负先生之教云。

门人 徐爰 书

【注释】

《大学》：原为《礼记》中的一篇，宋代理学家朱熹将它与《礼记》中的另一篇《中庸》以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起来编为《四书》，作为儒学的基本读物。朱熹认为《大学》原来的本子有误，他将该书原文划分为经一章，传十章，改了其中的字，增加了传一章。阳明不同意这种做法，认为《大学》原来并无错误。格物：《大学》修养方法之一。朱子认为格物是认识天人物我的道理。阳明认为格物是改正意念与行动中的错误。

爰：徐爰（1488—1518），字曰仁，号横山，浙江余杭人，阳明妹婿，也是他最早最得意的弟子，《传习录》的最早记录者。

二氏：释与老，即佛家与道家（包括道教）。居夷三载：正德五年（1505），阳明因得罪太监刘瑾，被贬为贵阳龙场驿（今贵州修文县）驿丞，于正德八年离开。该地为少数民族地区。夷是对少数民族的蔑称。

—

爰问：“‘在亲民’，朱子谓‘当作新民’，后章‘作新民’之文似亦有据。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‘亲民’，亦有所据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‘作新民’之新，是自新之民，与‘在新民’之新不同，此岂足为据？作字却与亲

字相对，然非亲字义。下面‘治国平天下’处，皆与新字无发明。如云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，‘如保赤子’，‘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’之类，皆是亲字意。‘亲民’犹《孟子》‘亲亲’‘仁民’之谓，亲之即仁之也。百姓不亲，舜使契为司徒，敬敷五教，所以亲之也。《尧典》‘克明峻德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以亲九族’至‘平章’‘协和’便是‘亲民’，便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。又如孔子言‘修己以安百姓’，‘修己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便是‘亲民’。说‘亲民’便是兼教养意，说‘新民’便觉偏了。”

#### 【注释】

朱子：南宋理学家朱熹（1130—1200），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号晦庵，卒谥文。理学之集大成者，著述富赡，弟子众多，影响深远，所作《四书集注》为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，他的思想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。《大学》篇首说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朱熹注认为，亲民的“亲”字应作“新”，革除旧的错误的意义。“作新民”是从《尚书》中引来的。    亲民：《礼记·大学》原作“亲民”。    五教：对于人际关系的五个方面的道德教化，即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。    九族：一说为自高祖至玄孙，一说为父族四、母族三、妻族一。

#### 【评析】

封建时代，人们有崇古情结，以为古代的人们特别是圣人是不

可超越的，思想家们都把自己的思想当作古代圣人思想的重新发现，并且往往以注释典籍的方式发表出来。不同的学派以不同方式利用古代经典，是常有的事，在这方面的争论也颇为不少。平心而论，朱子对《大学》的改动是多了一些，阳明的批评有一定道理，但他自己对该书的解说也有问题。

## 二

爱问：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子以为‘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’，似与先生之说相戾。”

先生曰：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却是义外也。至善是心之本体，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，然亦未尝离却事物，本注所谓‘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者得之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知止而后有定：语出《大学》。“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”，是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。义外：语出《孟子·告子上》。孟子与告子辩论仁义究竟是在内（心中）还是在外（在事物上）。孟子认为，仁义皆在内，告子认为仁在内而义在外。义外说受到孟子批评。至善：最高的善。这是道德观念，阳明以它来代替事物的定理。本体：本来的状态。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：这是朱熹对“至善”的解释。

### 【评析】

这里有两个预设，一是将朱子所说的“定理”定义为至善，一是

将至善设定为心之本体。从这个预设便可以看出阳明哲学的特殊性质。

### 三

爱问：“至善只求诸心，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。”

先生曰：“心即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、心外之理乎？”

爱曰：“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间有许多理在，恐亦不可不察。”

先生叹曰：“此说之蔽久矣，岂一语所能悟！今姑就所问者言之。且如事父，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？事君，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？交友治民，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？都只在此心，心即理也。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须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纯乎天理之心，发之事父便是孝，发之事君便是忠，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。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”

爱曰：“闻先生如此说，爱已觉有省悟处，但旧说缠于胸中，尚有未脱然者。如事父一事，其间温清定省之类，有许多节目，不亦须讲求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如何不讲求？只是有个头脑，只

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。就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闻杂；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只是讲求得此心。此心若无人欲，纯是天理，是个诚于孝亲的心，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，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，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。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，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，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。譬之树木，这诚孝的心便是根，许多条件便是枝叶，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，不是先寻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《礼记》言：‘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必有愉色，有愉色者必有婉容。’须是有个深爱做根，便自然如此。”

#### 【注释】

心即理：原为宋代心学家陆九渊（1139—1192）语，是陆氏哲学的主要观念，也是阳明哲学的主要观念。不成：难道。

温：冬天使父母温暖。清：音qìng，夏天使父母凉快。定：晚上为父母备受被褥。省：早上看视父母是否安泰。条件：一条一件的具体事项。

#### 【评析】

阳明认为，道德观念是人心的自觉，与纯粹外在的物理不同。譬如对于父母，要尽孝就要有一颗深爱父母的心，有了这个心自然有好的态度，有好的态度自然会有全心全意的敬爱的举措。如果

不把爱心树立起来，光学一点温清定省之类的举措，只是表面文章，不是真孝。

#### 四

郑朝朔 问：“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。”

先生曰：“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，更于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试说几件看。”

朝朔曰：“且如事亲，如何而为温清之节，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，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，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。”

先生曰：“若只是温靖之节、奉养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，用得甚学问思辨？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，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，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，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，所以虽在圣人，犹加精一之训。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，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，亦可谓之至善矣。”

爰于是日又有省。

#### 【注释】

郑朝朔：名一初，广东揭阳人。正德六年（1511）阳明在吏部任职，朝朔为御史，曾向阳明问学。 精一之训：即《尚书·大禹